

身体政治和历史书写：《没有指针的钟》解读

荆兴梅¹ 朱新福²

(1. 江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2.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没有指针的钟》的以往研究，并没有涉及作品的身体政治和历史书写问题。基于身体意象和文化历史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试图填补以上空白：首先，小说秉承麦卡勒斯对“怪诞性”的一贯偏好，以身体残缺隐喻精神困顿，并进一步指向奴隶制意识形态；其次，小说人物力图将自卑情结转化为优越情结，但遭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物化，呈现出幻觉性的审美主义本质；再次，在文化批评视野下，该文本中的音乐和身体本能具有革命的颠覆性，它们都对理性主义和专制统治实行解构。

关键词：身体政治；历史书写；卡森·麦卡勒斯；《没有指针的钟》；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荆兴梅(1969—)，女，江苏镇江人，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朱新福(1963—)，男，江苏南京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生态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城市化主题”(项目编号：14BWW068)、江南大学自主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城市化主题研究”(项目编号：JUSRP51415A)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I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5)05-0161-07 **收稿日期：**2015-04-07

在美国南方作家群中，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 1917—1967)可谓独树一帜，以描摹人性孤绝而著称。她有生之年发表的5部长篇小说，使她跻身于经典作家之列，曾被誉为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辉煌文学事业最有希望的继承者之一。20世纪40年代是麦卡勒斯写作的鼎盛时期，《伤心咖啡馆之歌》(*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1943)和《心是孤独的猎手》(*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1940)等名篇佳作均完成于这一时段。此后她历经病痛、婚变、战争等诸多疾苦，终于在1961年推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没有指针的钟》(*Clock without Hands*, 1961)。这部令评论界和读者群期待已久的作品，尽管将故

事场景依然设置在南方城镇，却对麦卡勒斯的早年创作进行超越和拓展。就叙事策略而言，怪诞意象和哥特手法是麦卡勒斯写作的标志性特征，《没有指针的钟》在有所继承的同时却又不限于此，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实行突破。就主题意蕴而言，这部小说不再拘泥于孤独的个体和令人绝望的人际关系等层面，而是在时空维度上进行大胆创新和变革，从而引领读者穿越美国奴隶制等历史隧道，来审视广阔的社会现实。

《没有指针的钟》一经出版即成为畅销书，迄今为止在学术界已涌现出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英国小说家特莱希对《没有指针的钟》的结构配置、人物塑造和深层主题均表示不太满意，认为

麦卡勒斯创作这部作品时缺乏深度想象力。^{[1]16-17}爱默生也对这部小说提出诸多诟病,认为麦卡勒斯将个性化和普遍性混为一谈,导致写作目的含混不清,其松散的结构也进一步削弱了小说的价值意义。^{[2]16-28}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上的否定性评价,并没能阻挡其他学者的赞誉之声。伊文斯强调麦卡勒斯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作家,但《没有指针的钟》的讽喻手法和身份主题还是颇值得称道的。^{[3]301-308}克拉克的论文《悲欢交织:卡森·麦卡勒斯小说的悲喜剧色彩》运用其中的一部分篇幅专门论及《没有指针的钟》,指出麦卡勒斯洞察到幽默在南方文学中的普遍性和渗透性,也洞察到美国南方作家和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的亲缘关系,两者都喜欢运用悲喜剧视角。^{[4]161-166}法国学者萨维诺的传记作品《卡森·麦卡勒斯的人生》指出,麦卡勒斯忍受经年的身体病痛和情感折磨,以坚强的毅力写就《没有指针的钟》;其所有创作足以使她跻身于世界经典作家之列,她对道德孤独的探索,对沟通和交流的渴望,都体现出最人性的体验和愿景。^[5]布兰纳在《没有指针的钟:卡森·麦卡勒斯及其生死节奏》中,表明该小说出版后褒贬不一,却无人论及作家的健康问题;而当生命开始走向死亡,病人却顿悟了自我升华和救赎之道,从而将伤痛转化为尊严,这就是马龙和麦卡勒斯的精神核心所在。^{[6]312-316}

国外学界对于《没有指针的钟》所展开的研究,大多没有跳出麦卡勒斯作品解读的常规窠臼:一方面,学者们执着于作家人生体验与小说人物故事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研究者大多无法走出新批评视野,对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性关注过多,对其中的历史性和政治性着墨甚少。而林斌等少数国内学者,则关注到了该作品的意识形态领域,认为麦卡勒斯用公共视角代替了以往的私人视角,其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都是为了呈现南方历史意识和文化精神内涵。^{[7]81-93}《没有指针的钟》的以往研究,并没有涉及小说文本的身体政治,也没有探讨历史书写问题。基于身体意象和文化历史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试图填补以上空白:首先,该小说秉承麦卡勒斯对“怪诞性”的一贯偏好,以身体残缺隐喻精神困顿,并进一步指向奴隶制意识形态;其次,小说人物力图将自卑情结转化为优越情结,但遭受消费主

义的物化,呈现出幻觉性的审美主义本质;再次,在文化批评视野下,该文本中的音乐和身体本能具有革命的颠覆性,它们都对理性主义和专制统治实行解构。

一、在残缺的身体和意识形态之间

麦卡勒斯创作以“怪诞性”而闻名,这一点首先小说人物的形体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聋哑人辛格和安东尼帕罗斯,还是《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罗锅李蒙,抑或是《婚礼的成员》(*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 1946)中展览会上的畸形人,都属于身体残疾、行事怪异的人群类型。麦卡勒斯对残缺意象的描摹这样乐此不疲,以至于每部小说几乎都带有诸如此类的印记。而在实际生活中,她始终对不正常事物怀有无以名状的痴迷,“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傻呆呆地盯着马戏团畸形人的小孩子”^{[8]257}。

《没有指针的钟》也将“不健全的躯体”纳入写作视野,老法官福克斯·克莱恩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他垂垂老矣一身是病,不但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而且还差一点因为中风发作而猝死。“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红通通的脸,脑袋上是一圈杂乱的白中带黄的头发。他穿一套皱巴巴的白衣服,一件淡紫色的衬衣,一条领带上夹着珍珠别针,还看得到上面有一处咖啡污渍。他的左手在一次中风之后损坏了,因此他小心翼翼地将手靠在柜台边沿上。”^{[9]13}就是这样一个年逾古稀、不修边幅、身体颓败的老人,却怀有恢复美国南方奴隶制的勃勃野心。首先,老法官悄悄囤积下一千万南部联邦货币,梦想着黑奴成群的岁月卷土重来,他好坐拥财富和奴隶主身份。其次,他的儿子约翰尼为黑人伸张正义而死,而约翰尼之死与老法官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不无关系。再次,老法官逆历史潮流而动,试图通过电台呼吁人们重建种族隔离制度,却匪夷所思地演变成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终究以失败而告终。小说中的历史事件纷至沓来,“奴隶制”“林肯”“葛底斯堡演讲”等关键词,将《没有指针的钟》演绎成标准的政治文本。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在其著作《美学意识形态》中指出:“今天,极少的文学文本可能使之成为新的历史主义准则,除非该文本至少包含着一个残缺不全的身体。”^{[10]17}残缺的身体是绝佳载体,人们由此可以对社会体

制和世界历史等一窥端倪。老法官那失去健康的躯体，象征着灭绝人性、不合时宜的奴隶制，既能呈现他们作威作福的过去，又能表达他们陷入绝境的现实，从而达成形影相吊的艺术效果。

老法官所代表的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可以与美国历史上耸人听闻的麦卡锡主义相提并论。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是世界格局产生巨变的多事之秋，素有“美国文革”之称的麦卡锡主义运动，就发生在1950—1954年间，而《没有指针的钟》的故事时间正是1953年。美国参议员麦卡锡一向是巧言令色的政客，差点因为臭名昭著被国会扫地出门。为了保住他在国会中的位子，麦卡锡无所不用其极，开始炮轰美国国务院，并在政府机构、文艺界和媒体部门，掀起一场迫害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比如在政要机构，他将矛头直指前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等人，公开宣称马歇尔为“叛徒”和“谋杀者”，罗列其莫须有的罪名，致使马歇尔蒙受不白之冤，最后辞去公职告老还乡。麦卡锡同样不肯放过文学领域，派人清查美国设在海外的使馆藏书目录，进而判定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人士的作品为禁书。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连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史莱辛格和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放入禁书之列。据统计，当时所禁之书达到两百万册之多，使得美国一些学校和图书馆闻风丧胆，纷纷焚烧所谓的有害书籍，酷似中国古代的“焚书坑儒”事件。在媒体上，麦卡锡控制了美国之音等新闻渠道，以便更严酷地打击共产党和左翼份子，喜剧大师卓别林当年就曾经深受其害。^{[11] 366-74}

在笔者看来，老法官和麦卡锡其人的相似之处，无不与“身体”意象有关联。第一，他们都通过巧舌如簧的自我推销达到政治目的。麦卡锡曾在1939年以虚报年龄的方式，参加威斯康星州第七区巡回法庭法官的竞选，成为该区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他此后又于1946年参加该州竞选，并成功当选为参议员。而他在政治上频频得手的秘诀，据说就是源自大胆和说谎，而这一点也得到了美国史料的证实。《没有指针的钟》的老法官，和麦卡锡一样都曾经身居高位，连“法官”到“参议员”的身份都一模一样。读者无法追溯老法官当年是如何走上政治舞台的，但从文本提供的线索来看，他的能言善辩确实和麦卡锡如出一

辙。老法官动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成为他巩固自身地位、赢得他人崇拜的有力保障。即使老法官退休在家疾病缠身时，药剂师马龙也常常会产生错觉：“不过都是老法官高谈阔论，马龙侧耳倾听。在这种时候，马龙有接近权力中心的感觉——几乎感到仿佛自己也成了一名国会议员了。”^{[9] 15}

第二，麦卡锡迫害美国共产党人，老法官组织谋杀黑人，两人都对他者实施身体和精神暴力。麦卡锡主义当道之时，连马歇尔等身居要职的美国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未能幸免，很多政界和文艺界人士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受残害，可见麦卡锡试图清剿共产党的手段何等残忍。而《没有指针的钟》表明：“在早年，法官还是个三K党人，而在这个秘密组织被查禁的时候，他逃脱了，所以他不能参加在松山镇举行的白袍人的那些集会，给自己注入秘密、无形的力量。”^{[9] 242}文本中提及的“三K党”（Ku Klux Klan，缩写为K.K.K.），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的恐怖主义组织，它以奉行种族主义暴行而为人所知。所谓“白袍党”指的是三K党成员白袍加身、蒙面示人，以这种民间的方式来对黑人处以私刑，所以这个组织又被称作白色联盟和无形帝国。三K党奉行白人至上主义原则，对黑人实施杀戮，其中的恐怖气氛和仇杀心理至今让人触目惊心。麦卡锡针对的是美国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老法官针对的是非裔美国人，尽管仇视的对象有所不同，但两者对暴力和暴政的推行都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第三，最终两人的身体每况愈下，都与其政治理想破灭有关。麦卡锡的为所欲为激起美国人民的公愤，军方决定召开听证会，公开声讨麦卡锡的恶行。1954年，美国有线电视现场直播了这场听证会，由陆军部公布麦卡锡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当其反动黑幕公之于众后，他很快变得声名狼藉，48岁时在一家海军医院死于肝病。与麦卡锡相比，老法官所奉行的种族主义，也遭遇了“滑铁卢”。老法官曾经在高尔夫球场突然晕倒而掉进池塘，是身为球童的黑人舍曼奋力相救，老法官感激之余邀请舍曼担任贴身秘书。当年老法官对舍曼的孤儿身世难辞其咎，如今又让舍曼起草种族主义提案文件，这一切令洞悉了真相的舍曼怒不可遏、拂袖而去。老法官听闻舍曼公然住到白人聚居区，想派马龙前去暗杀，但马龙已经

洞察老法官的残忍本性,于是断然拒绝。而老法官的孙子杰斯特,也对种族歧视政策深恶痛绝,在得知谋杀舍曼的计划后,不顾一切地通知了舍曼。书中主要人物黑人舍曼、马龙、杰斯特,都选择与老法官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分道扬镳,终于令其对奴隶制的幻想趋于破灭。

由此可见,老法官的身体疾病是麦卡勒斯刻意为之的一个隐喻。它表明,老法官之流所倾心打造的奴隶制复辟构想,是违背历史和人性的反动潮流,人们有必要对它展开批判和解构。它打通文本内和文本外的藩篱,将叙事结构十分自然地延伸到文化政治层面,和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历史事件形成互动,以此强调:身体疾患往往是思想障碍的具体表现,更是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有力佐证。

二、身体认同:消费社会的自卑和自恋情结

青年舍曼是《没有指针的钟》里另一个浓墨重彩的人物。他经历复杂、性格多变,有别于麦卡勒斯笔下的其他美国黑人:如果说《婚礼的成员》中的贝丽尼丝悲天悯人,而《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考普兰德鞠躬尽瘁,都称得上是黑人民族的代言人,那么舍曼则是一个劣迹斑斑的“恶棍英雄”。他的形象充满矛盾和悖论,其不幸遭遇令人一掬同情之泪,其流氓行径又令人避之唯恐不及。假如故事能够还原成线性陈述,那么应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那时候的美国南方种族主义和经济大萧条齐头并进。黑人琼斯和白人奥西·立特尔是同一座奴隶主庄园的收益分成佃农,之后琼斯被控告谋杀了立特尔,理由是琼斯和立特尔太太有染。琼斯在陪审团的坚持下被宣判死刑,立特尔太太生下舍曼后含恨死去,律师约翰尼也因辩护失败而自杀身亡。舍曼在家族的血海深仇中降生,又因为黑人孤儿身份饱受社会凌辱,这使他产生了仇视社会的心理,常常以恃强凌弱、狂妄自大的姿态行事。

舍曼的自命不凡其实是一种自卑人格的体现。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理论认为,人类大多生而具有自卑感,比如儿童由于事事屈就于大人而产生自卑,器官有缺陷的人因异于正常形态而深感卑微,等等。阿德勒强调人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成功,从而将自卑情结转化为优越情结,也可

能误入消极补偿而损害自我和社会。^{[12]200}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具有同构性,它们都尊重个体发展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萨特“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等理念,呼吁大众走出本质主义体系的桎梏,消解先天论和出生论等陈词滥调。在个体心理学和存在主义理论的激励机制下,人们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信通过自我奋斗终能改变命运。舍曼处于黑人和孤儿的双重困境而自卑不已,然而他却矫枉过正,幻想著名女低音歌唱家玛丽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 1897—1993)才是自己的生母。安德森夫人在美国历史上确有其人,她于1939年受总统罗斯福之邀到白宫演唱,于1958年被提名为美国驻联合国亲善大使,1963年获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1991年获格莱美终生成就奖。无论是在白人主流阶层还是在黑人社会,安德森夫人都是闻名遐迩的女中豪杰:她曾在密西西比州的演唱会上,邀请所有观众和她同唱最后一首歌,把黑人和白人聚合到了一起;她也曾在罗斯福妻子埃莉诺的帮助下,在靠近林肯纪念馆的广场上举办免费个人音乐会,引发75 000人前来观赏她的表演。^{[13]641-671}舍曼将这样一位女性认同为母亲形象,是其自卑心理过度补偿的结果。他试图超越自卑、追求卓越,试图用安德森夫人的名人效应来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而并非出于对亲情和母爱的考虑。

安德森夫人和那些名牌商品一样,在舍曼这里沦为了空洞的能指符号。舍曼购买名酒、钢琴、古董沙发等物品,他穿美国最大品牌的浩狮迈西装和北美百年名牌的哈瑟维衬衫,以此作为人前炫耀的资本。“虽然舍曼没有明说,但是很显然,他是受到‘名人广告’的影响,才买了这一年他喝的威士忌。他的穿着也是竭力模仿‘名人’广告里那个人不修边幅的风格,但是挪到他身上,那样子就成了凌乱邋遢。他是城中衣着最刺眼的人之一,他有两件哈瑟维衬衫,戴一个黑色眼罩,但是他戴了黑眼罩并没有让他气度不凡,倒反而显得模样可悲,并且老撞到东西。”^{[14]75}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身体受到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塑造和规划,身体及其相关的饮食起居无不烙有物质主义印记,个体也唯有在此种文化符号中才获得自我认同感,自恋人格随之崛起:“……衣物,现在不仅是社会及个人认同的表达,同时是身份认同

的创造者。着衣身体的表演及行为与姿势的沉默成为身体工具性的一种根本形式……围绕着身体的符号(从身体的外层到周围的必需之物),作为表达和创造个体身份或主体自我的方式而发挥作用……^[14]^[54-55]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视下,舍曼使用名牌服饰和家具等消费符号,来掩盖自我卑微的身份和心态,获得一种幻觉式的审美效应。当“风格款式新颖美丽的衣饰等就成了人们确立自我认同、表现自我的重要方式”^[15]^[65],商品的实际用途和所指意向也就荡然无存,因此舍曼既没有从名牌消费品中获得快乐,其人格也没有从真正意义上高贵起来,而是在一堆能指碎片中变得愈加猥琐和偏激。

消费品对舍曼的异化和腐蚀作用,在舍曼面临死亡威胁时发挥到了极致。老法官处心积虑要除掉舍曼,杰斯特赶过来催促舍曼逃走,然而舍曼却痴迷于他所购买的名牌商品,以至于将生死置之度外:“‘丢下我这些家具?’随着杰斯特非常了解的情绪的又一次波动,舍曼此刻开始介绍他的家具。‘你还没有见过我的卧室家具呢,还有粉红的被单,闺房用的枕头。我的套装你也没有见过。’他把壁橱的门打开。‘四套崭新的浩狮迈男装。’他突然转身来到厨房,说道:‘厨房配备了各种现代化设施。都是我自己的。’沉浸在拥有这一切给他带来的欣喜若狂之中,舍曼似乎已经把忧虑忘得一干二净。”^[9]^[251]舍曼对物品的迷恋几近病态,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也舍不得离开品牌家具和服饰等。这种极端的拜物心理,并非源自现实生活中的商品实用性需求,而是完全出于对文化符号和虚假身份的追逐,与他一厢情愿认安德森夫人作为母亲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以舍曼为典型代表的消费群体,在丰裕的物质中不断沉浮,其实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不无关系。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教授费瑟斯通不仅洞察到身体和服饰等消费品的异化关系,^[16]^[179]而且还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概念的最早定义者。该命题认为现代社会的审美越来越趋于日常生活化,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壁垒也在逐渐消失。^[17]^[48-53]而国内学者陶东风也表明:审美活动已经超出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具体表现在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诗歌、绘画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

的泛审美/艺术门类,如广告、流行歌曲乃至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等。而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18]^[165-171]在伊格尔顿看来,审美与各种专制主义水火不容,其终极目标是解构意识形态,建构平等和谐的社会图景。^[10]^[16]而金钱主义和享乐主义社会思潮,呈现了审美主义的幻觉性体验,其实质却是一种文化殖民。它将身体和文化都沦为商品,让自我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消失殆尽。舍曼无疑是这一权力系统的牺牲品:他除了具有粗俗无礼和自吹自擂等恶习外,还分外热衷于暴力,比如他曾经无故吊死了他人的爱犬。可见,在种族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共谋中,舍曼“为民族而战”的初衷因无法抵御物质侵袭而失败,只能在自卑和自恋中日夜徘徊,以至于性格扭曲、行为失当,成为了悲剧的主人公。

三、音乐和爱欲本能

《没有指针的钟》在文本内和文本外形成对话关系,涉及诸多历史人物和文化事件,约翰·布朗(John Brown, 1800—1859)就是其中一例。布朗是一位白人废奴主义者,从小目睹了许多奴隶起义和奴隶主的残酷镇压,遂萌发了献身废奴事业的决心。他原本以为通过非暴力运动可以争取黑奴解放,但后来发现这是不切实际的,唯有流血牺牲的暴力行为才能终止万恶的奴隶制。布朗于1859年率领由22个白人和黑人组成的武装队伍,进攻弗吉尼亚州的哈帕尔斯渡口,发动美国历史上的“约翰·布朗起义”。他逮捕种植园主、解放奴隶,主张消灭奴隶制,表现出大无畏的英勇气概。起义后来被美国军事家罗伯特·李将军所镇压,布朗随之遭到逮捕并杀害。在布朗殉难的那一天,许多地方举行了游行示威,教会鸣钟为他祈祷。马克思、恩格斯、卢梭、爱默生等人,都对布朗的起义和牺牲给予很高评价。布朗的英雄壮举意义重大,为1861年爆发的美国内战吹响了号角,也为1865年美国奴隶制全面废除奠定了基础。此后,以这一事件为原型的革命歌曲《约

参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982531.htm>。

翰·布朗的遗体》(John Brown's Body)广为流传,麦卡勒斯在写作《没有指针的钟》时也将它放了进去。在理想读者的眼中它就是一首背景音乐,自始至终回荡在作品的脉络之中。

纵观整个小说文本,杰斯特的思想观念与约翰·布朗最为贴近,两者自然而然形成互文关系。当老法官要求杰斯特报考西点军校以便日后崇尚武力时,杰斯特却宁愿选择音乐和飞行作为终生职业。他也不像愤懑而死的父亲约翰尼,相比之下,他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加坚定的信念。杰斯特以白人身份去反抗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所采取的抵抗手段不如约翰·布朗来得激进,得到的效果却异曲同工。在与舍曼的交往过程中,杰斯特的种族平等思想展现得一览无余:他最初被舍曼的音乐才华吸引而前去相识,后来产生依恋之情,再后来试图帮助舍曼摆脱种族主义迫害。音乐几乎成为麦卡勒斯长篇系列的灵魂,《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米克、《没有指针的钟》里的杰斯特,都拥有出众的音乐天赋。他们和作家麦卡勒斯一样,把音乐当作抗衡异化世界的有力武器。这种与生俱来的音乐直觉和本能,可以追溯到麦卡勒斯的亲身经历:她从小被目为音乐神童,即使在成年后以写作为生,听音乐、弹钢琴依旧是家常便饭,与音乐家交往更是司空见惯,比如大卫·戴蒙德(David Diamond, 1915—2005)就曾经与她过从甚密。麦卡勒斯与其书中人物共享的另一个私密空间,便是同性恋欲望:杰斯特对舍曼产生复杂情愫和禁忌之恋,麦卡勒斯和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 1911—1983)、大卫·戴蒙德的情感纠葛,虽然不见容于公共领域,但都成为评论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杰斯特所付出的是柏拉图式纯真之爱,并不掺杂任何功利因素,他对黑人民族的同情和理解,正是在与舍曼的交流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所以音乐本能和爱欲本能,成为杰斯特抵抗种族主义权力结构的有效策略,他和约翰·布朗的本质是相似的,都是白人废奴主义的同盟军。

伊格尔顿指出,在马克思的革命政治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如

果说审美渗透了卡尔·马克思的最重要的政治范畴和经济范畴,它同样渗透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10]244}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本我和超我、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直接等同于感性主义和理性主义两个不同的世界。象征秩序强调本我的破坏性力量,所以竭力压制和打击它,以便引导它向超我转变,成为遵守规范的“忠臣”和“良民”。殊不知,超我实质上是悲剧性的,人们会因笃守社会法则和工具理性而导致自我憎恨、自我分裂;本我却是喜剧性的,它因为遵从人类天性和感性而使人格灵动活跃。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意识形态领域:社会若一味推崇理性主义,则必将滑入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陷阱,此时感性和本能就要挺身而出,唯有这样才能建立和谐平等的大同世界。欲望具有革命性特质,它既是精神病人走出抑郁、恢复生机的良方,又是个体和民众反对霸权、建构身份的必经之路。^{[10]251-266}《没有指针的钟》赋予杰斯特音乐直觉和爱欲本能,其目的就是让他运用能动的感性陈述,来消解象征系统和宏大叙事。经由这种方式去对抗种族主义体制,杰斯特这一人物形象无疑是突破性的。在这里,麦卡勒斯对“爱之本能”进行的诠释,同样架起一座沟通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桥梁,正如伊格尔顿所总结的那样:“获得更加互惠的爱的方式是精神分析的目标之一,也是革命政治的目标之一。”^{[10]269}

与麦卡勒斯其他作品相比,《没有指针的钟》称得上是鸿篇巨制。它超越了“人之孤独”和“精神隔绝”的狭隘主题,呈现出恢弘的政治和历史画卷。老法官和舍曼都是悲剧英雄的典型代表:前者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沉迷于不合时宜的历史记忆中无法自拔;后者纵然有抗衡种族主义的梦想,却受困于消费浪潮中,致使“走出自卑、追求卓越”的理想流于破灭。唯有白人废奴主义者杰斯特,身处自我人格和革命精神之间的契合点,从而以独特的方式建构文化身份。作为美国白人小说家,麦卡勒斯用高屋建瓴的姿态来审视种族关系,与同为南方作家的福克纳相映成趣,其政治高度和艺术才华都是不容置疑的。

参考文献

- [1] Tracy R. A Voice Crying in the South[J]. The New Republic, 1961, (13).

- [2]Emerson D. The Ambiguities of Clock without Hands[J]. Wisconsin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62 ,(3).
- [3]Evans O. The Achievement of Carson McCullers[J]. The English Journal ,1962 ,(5).
- [4]Clark C K. Pathos with a Chuckle : The Tragicomic Vision in the Novels of Carson McCullers[J]. Studies in American Humor ,1975 ,(1).
- [5]Savigneau J. Carson McCullers : A Life[M]. New York : Houghton Mifflin ,2001.
- [6]Brennan F. Clock Without Hands : Carson McCullers and the Rhythms of Living and Dying[J]. American Journal of Hospice and Palliative ,2013 ,(3).
- [7]林斌. 寓言、身体与时间：《没有指针的钟》解析[J]. 外国文学评论 ,2009 ,(4).
- [8]弗吉尼亚·卡尔. 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M]. 冯晓明,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6.
- [9]卡森·麦卡勒斯. 没有指针的钟[M]. 金绍禹,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7.
- [10]特里·伊格尔顿. 美学意识形态：修订版[M]. 王杰,付德根,麦永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 [11]张红路. 麦卡锡主义的兴衰[J]. 世界历史 ,1983 ,(4).
- [12]车文博. 西方心理学史[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 [13]Eidsheim N S. Marian Anderson and“ Sonic Blackness ”in American Opera[J]. American Quarterly ,2011 ,(3).
- [14]Falk P. The Consuming Body[M]. London : Sage Publication Ltd ,1994.
- [15]欧阳灿灿. 身体化的自我：消费社会的“自恋”人格[J]. 吉首大学学报 ,2013 ,(6).
- [16]Featherstone M. The Body in Consumer Culture[C]. The Body :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 Sage Publication Ltd ,1991.
- [17]王焱.“ 日常生活审美化 ”论争的三大焦点[J]. 东方论坛 ,2007 ,(2).
- [18]陶东风.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 浙江社会科学 ,2002 ,(1).

[责任编辑：杨雅婕]